中国驻英使馆参赞马格里其人其事

吴宝晓

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hought and identity of Halliday Macartneg, and the anecdotes of Halhdag Macartney's stance at work.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Halliday Macartney, as a diploma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Britain, had safeguarded China's interests and had serv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.

由于缺乏翻译人才，不了解西方情况，为了应付“华洋交涉之事无日无之”的局面，中国近代驻外使馆中不得不任用一些西方人，以担任翻译、律师、参赞等职务，[①]帮助处理对外交涉。这些人当中，以马格里最为著名。从1876年到1906年，他在中国驻英国使馆连续工作长达三十年，并参与中国驻英使馆的许多重要外交谈判。尤其在曾纪泽和薛福成任期内，他起的作用至关重要。但有人怀疑他在外交中，偏袒英国，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英国外交部派到中国驻英使馆的奸细。真相如何，有待澄清。

一、马格里的理想

马格里（Halliday Macartney，1833－1906），字清臣，英国苏格兰人。1852年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，1859年随英国驻印军参加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战争结束后参加常胜军。当常胜军头目戈登想让他担任常胜军头目时，马格里曾向戈登表明，他的志向是“在中国的宫廷之中谋求发展。只有当带领常胜军是一项临时性的事情，并作为实现自己真正目标的一个阶梯时，才能担当领导常胜军的任务。”他的真正目标是，“当熟练掌握汉语后，就像十七和十八世纪南怀仁和其他法国传教士一样，在北京活动并产生影响。”[②]

马格里的目标是远大的。不过他并未具体说明，他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他所要效法的法国传教士在华的主要活动，是以传播西方科技为手段，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。这些传教士以利玛窦、汤若望等开其端，其次有南怀仁（Ferdinand Verbiset，1623－1688，比利时人，非法国人。著有《坤舆图说》等书）、徐日升和张诚等人。为了达到目标，他们经常以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外交官和宫廷翻译的身份出现。马格里想效法的南怀仁，一直受康熙皇帝的重视，并担任过钦天监监副之职，负责修订历法。他还以一个宫廷翻译的面目出现，在1676年的中俄交涉中起作用。马格里不是传教士，他来中国的目标不大可能是传播基督教。他的目的，极有可能是传播西学，或者在中英之间的外交中起一些作用，也未可知。正如后来（1899）他声称的那样，“自从随第一任公使（指郭嵩焘）到伦敦后，经常的和全部的努力，是使中国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，使英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大国一样。”“我给中国的话一直是：想让其他国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你，你必须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。”[③]这就是说，马格里的目标，一方面是中国遵守国际惯例；一方面是使英国平等对待中国。这种理想，可说堂堂正正。使中国遵守国际惯例，符合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趋势；使英国平等地对待中国，虽然未必能实现，但当时中国是弱国，受到列强的欺凌，马格里此举，可说颇具正义，无可厚非。

马格里很快受到李鸿章的器重，并和曾纪泽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在江南制造局中，他受李鸿章之托，制造西式火器。但他是学医出身，制造枪炮等事非其所长，后因所造炮弹

发生爆炸被免职。马格里想在中国发展的理想受到严重挫折。恰在此时，中国准备向英国派遣公使。曾纪泽将其推荐给李鸿章，李鸿章又推荐给郭嵩焘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亦极力推荐，于是马格里得以任中国驻英使馆翻译。

如果从马格里得到威妥玛推荐一事中，得出马格里是受英国外交部的指派，甚至说他是英国外交部派来的奸细的结论，实属误解。按照国际外交惯例，甲国任命使节到乙国，公使必须征得乙国的同意，其他人员虽然不必获得同意，但他要告知乙国。马格里显然属于这种"必须告知"的情况。他和英国外交部并无任何隶属关系。

二、"仍然是一个英国人"

马格里初到中国驻英使馆时，与中国公使的合作，并不协调，甚至发生冲突。1881 年前，他过于关注维护英国利益，行事颇为武断，并在处理禁止鸦片贸易问题时，不能按照公使郭嵩焘的意见处理事务，几乎遭到辞退。到 1881 年前后，他的态度有所改变，赞同禁止鸦片贸易，同意对鸦片实行税厘并征，并在谈判中"在事出力"。

对于能到中国驻英使馆担任翻译，马格里感到"高兴"，"非常自豪"。④他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翻译之职，并且他的仿效十七、十八世纪法国在华传教士的理想，眼看就有实现的可能了。⑤马格里对于翻译一职极为看重。他认为，这样他就能"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利益"，因为中国驻英使馆涉及一些"政治或军事利益"，如"监督中国与外商签订的合同之执行，收集信息"，等等。⑥虽然后来有人称马格里"比中国人更中国人"，马格里也表示"中国是我的顾客，我尽力为他们做事。"⑦但在 1881 年前，情况并非如此。在一些活动中，马格里表现出过于关注英国利益的倾向。当郭嵩焘准备前往英国时，马格里就用他"全部的智力和影响力"，使郭嵩焘一行乘座英国船只，而不是乘坐法国船只前往，以便途中能在英国的六个占领地香港、新加坡、锡兰、亚丁、马尔他、吉布提停留，以加强郭嵩焘对英国的印象。马格里此举深得威妥玛的欣赏，称"马格里博士仍然是一个英国人"。⑧马格里的传记作者波尔格认为，马格里此举表明，他是"一个真正的爱国者"。⑨在处理中国驻英使馆和英国禁烟协会的关系上，马格里最初害怕中国使馆和英国禁烟协会接触，并认为只有当中国禁止土产鸦片后，才能和英国进行禁止中印鸦片贸易的谈判。这使其态度与中国驻英公使的观点不相一致，也不利于中国和英国进行税厘并征谈判，并使他几乎被辞退。

1876—1885 年，和英国进行鸦片税厘并征谈判，促其签订中英烟台条约，是中国对英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清政府想通过采取提高鸦片进口税，实行鸦片税厘并征的办法，寓禁于征，逐步减少鸦片输入，最后达到禁烟目的。1876 年签定的中英《烟台条约》中，有对鸦片进口实现税厘并征的条款，但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，迟迟不予批准。

这时，英国国内存在相当规模的禁止鸦片贸易的力量。1874 年，"英国东方禁止鸦片贸易协会"成立后，积极在英国各地的商会中进行活动，力图说服英国商人支持中国对鸦片进口实行税厘并征，支持中国禁止鸦片贸易，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1877 年 1 月，郭嵩焘出使经过香港作短暂停留时，英国禁烟协会试图与他联系，但为马格里婉言阻止。⑩4 月，英国禁烟协会主席夏弗斯等五十余人拜访郭嵩焘，询问中国对鸦片问题的真正态度。郭嵩焘强调，吸食鸦片之害甚于英国的酗酒。⑪但中国使馆事后翻译发表的马格里起草的"官方"译文中，没有重在强调鸦片贸易的危害性，而是强调应由中国首先禁烟，然后才能与英国讨论禁止鸦片贸易，因而违背了郭嵩焘的原意，并擅自进行了许多发挥。⑫郭嵩焘对此极为愤怒，认为马格里"乃至尽反吾所指授之言而自发议论，顽言不顾，使人茫然不解其心意之所属。"⑬郭嵩焘对此耿耿于怀。他曾对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说，严格地讲，马格里与政治事务无关。马格里在答复一个有关鸦片问题的代表团时，没有正确地翻译郭嵩焘的话。⑭郭嵩焘曾对中国海关人员屠迈伦和金登干表示，他希望有一个中国海关的人接替马格里，但因马是李鸿章推荐的人，所以不便辞退。⑮1877 年 7 月 1 日，金登干在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电报中，也透露出类似的情况"郭不满意马格里，有意要一位海关人员取代，但又无法辞掉他，唯恐得罪李

鸿章。”[16]郭嵩焘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[17]

1879年10月，禁烟协会致信中国新任公使曾纪泽，说明禁烟协会的主张，并呼吁曾纪泽予以支持。禁烟协会将曾纪泽的复信，及禁烟协会秘书特纳的说明书，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发表。说明书中称赞曾纪泽感谢英国禁烟协会的勇气。禁烟协会在发表曾纪泽的复信时，事先并未征求曾纪泽的意见，马格里担心引起麻烦，致函《伦敦与中国电讯报》，表示曾纪泽并未说是否同意禁烟协会的主张，只是说他同情禁烟协会的“动机”。马格里此举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。曾纪泽赞同禁烟协会的主张，自属正常现象。[18]

1881年11月3日，禁烟协会开会讨论禁止鸦片贸易问题。会中在禁止鸦片贸易的方法问题上产生分歧。有人认为，最好的方法是废除鸦片贸易。印度政府应该“迅速地完全地停止鸦片生产”；另有人认为，逐渐禁止的办法更为可行，因为中国政府不大可能迅速禁止种植罂粟。禁烟协会将会议的决定通知曾纪泽，并要求他谈谈对于鸦片贸易的“私人观点”。[19]在答复中，曾纪泽鲜明地表达了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态度：“只要鸦片仍然是鸦片，只要人的身体组织没有改变，寻求减少鸦片罪恶的中国政府，就永远对鸦片造成的危害感到痛心。”[20]对于禁烟协会不同的禁烟方法，曾纪泽认为，他“毫不犹豫地支持逐渐禁止的方法”。对于迅速废除鸦片贸易的主张，曾纪泽感到目前尚难以实行。他说：“迅速地完全地禁止印中之间的鸦片贸易的方法，无疑更为英勇；但因为它英勇，不幸在政治和经济上难有立身之地”。曾纪泽列举了难以迅速地完全地禁止鸦片贸易的原因：许多人以鸦片贸易为生，罂粟种植面积甚广，数百万人吸食鸦片，等等。在支持逐渐禁烟方法的同时，曾纪泽认为，实行禁烟的最好方式，是印度和中国政府就鸦片问题达成协议，逐渐限制罂粟的种植面积。[21]这封复信是马格里写的。通过这封信，可看出马格里对禁止鸦片贸易的立场有所改变，“采取了比较清楚的和比较肯定的立场”[22]，同意逐渐禁止中印鸦片贸易。

1882年，在北京进行的中英鸦片税厘并征谈判陷入僵局。清政府命曾纪泽利用英国禁烟运动兴起之机，在伦敦和英国直接谈判。1883年春，初步的、非正式谈判在英国外交部进行。英方的代表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及英国外交部和印度政府的代表，中方代表则为马格里。4月，英国不同意对鸦片实行同一税率，不同意总理衙门每箱鸦片征收厘金80两的建议，只同意每箱征收70两。此时，马格里反对鸦片贸易的态度比较坚决。并认为，税厘并征的数额应是每箱120两，实际可征收110两。此外，税厘并征的目标，应是“禁止而不是鼓励鸦片贸易”[23]。这个数额和目标，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认定的目标比较一致。这说明，马格里对鸦片贸易的态度，已和中国政府的立场趋于一致。

三、“惟以裨益中国为心”

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，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。危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。在西北方面，俄国占领了伊犁及其周围地区；在西南方面，英国占领了缅甸，法国占领越南。在对待边疆问题上，驻英公使曾纪泽、薛福成主张加强控制，或拓展中国边界，从而巩固中国边防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马格里与中国公使的立场完全一致。他基本上能够站在中国一边，维护中国的利益。特别是在中俄伊犁谈判、中英缅甸谈判中，他的贡献比较突出，受到中国驻英公使的肯定。

七十年代，沙俄占据中国的伊犁地区。1879年，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机亚条约中，中国虽然收回伊犁，但付出重大代价，以致收回与不收回相同，甚至还不如不收回。1880年，清政府派曾纪泽出使俄国，谈判修改崇厚签订的条约。

对于伊犁，曾纪泽出使英国前设想的方案是“以地换人”，用伊犁交还白彦虎。出使以后，曾纪泽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，坚决主张收回伊犁，并认为改约的目标，“宜办到通商稍予推广，伊犁归还，乃可真为了局。”[24]为此，曾纪泽采取“重界轻商”的策略，即在土地问题上坚不让步，而在一些商业利益上可以让步。将领土利益和商业利益分开。曾纪泽的这个策略的形成，与马格里的启发有一定关系。

1879年4月，马格里向曾纪泽提议，一些不平等条约，中国可以考虑修改，并认为修改条约的建议应由中国首先提出，以便修改某些不利于中国的规定。“修约之事，宜有中国

发端。明告西洋各国，云某年之约，有不便于吾民者，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，不复遵行。”[25]这给曾纪泽一定启发。曾纪泽听后认为，虽然涉及领土的规定一时难以改变，但一些涉及商业的条约规定确实可以改变：“盖壤地之借属，如香港、九龙司之类，则系长约不变。其余通商章程，与时迁变，尽可能商酌更改以求两益，并非一定不易者。”[26]马格里对中国收回伊犁持乐观态度，并估计，改约谈判的结果，将会以中国收回全部失地而告终。即使一点土地仍为俄国占领，也与整个收回的意义不相称。[27]曾纪泽到俄国进行谈判时，由于坚持“重界轻商”的原则，因此虽然在谈判时，中国国内各种观点甚多，重界重商，莫衷一是，但谈判仍然取得成功。

从1794年起，缅甸就是清朝的藩属国，十年朝贡一次。1885年，英国向缅甸发动进攻，占领缅甸都城，俘虏缅甸国王。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照会总理衙门，从1886年起，英国将正式兼并缅甸。马格里提出中国可乘缅甸局势混乱之机，在云南拓展边界，英国将八莫及萨尔温江以东、瑞丽江以北地区让给中国、中国在伊洛瓦底江上拥有某些航运权利的建议[28]，以便在中国云南和缅甸英占区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，巩固中国边防。这个建议得到曾纪泽的赞同。曾纪泽建议总理衙门，趁英、缅争议未定之机，开拓云南边界：“宜自腾越西出数十里，取八莫，据怒江上游以通商，勿使英近我界。”[29]1885年12月，他致电总理衙门，建议出兵占领八莫：“请英以八莫为我之商埠。彼灭缅，我占八莫，彼保护缅，我保八莫。”[30]英国外交部也同意缅甸北部的部分土地，可听从中国处理，“或中国留为属国，或收为属地，悉听中国之便。”曾纪泽电告总理衙门，主张对这些地方，中国“似宜受之”，将其作为属国，“责其按期朝贡，并将（中国）上邦之权，明告天下，方可防边患而固边圉。”[31]在谈判中，马格里多方奔走。他与英国外交部及印度事务部保持联系，说明中国立场，了解英国观点，递交中方照会，向英方施加压力。他还让人在英国《泰晤士报》、《辩论报》等新闻媒介上发表文章，支持中方立场，向英国外交部施加压力。他多次与英国外交部及印度事务部谈判，敦促英方同意中方拓展云南边界的要求，由缅甸定期向中国朝贡。但是拓展边界的建议遭到总理衙门的反对。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认为，曾纪泽的建议，“无论人力财力现办不到，即使如愿，乘彼乱而拓我界，名亦不正。”[32]总理衙门真正关心的，是在清政府的天朝体制下，保全缅甸的王位和缅甸继续向中国朝贡的问题。1885年，它规定，曾纪泽在缅甸问题上的谈判目标是：“以（英国）勿阻（缅甸）朝贡为第一义。但使缅祀不绝，朝贡如故，于国便无失礼。八莫通商宜作第二步办法。”[33]这样，中英关于缅甸问题谈判的结果，便是在英国承认缅甸定期向中国朝贡的情况下，吞并缅甸了事。此后，薛福成为了实现曾纪泽的主张，让马格里再与英国外交部联系。马格里与英国外交部、印度事务部及英国驻缅甸殖民官员进行交涉，但终于没有结果。马格里对总理衙门不同意拓展云南边界的作法很不理解，[34]对中国忽视边疆安全的作法非常不满，认为“非中国之不能管辖各地，实由中国与边界之事，太不加意，甚可诧也。”[35]马格里的这种立场，得到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的肯定。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，他认为，马格里在中英滇缅交涉中，“始终其事，惟以裨益中国为心。”[36]薛福成的观点，反映了当时中国官方的立场，也大致符合实际情况。这些话通过薛福成之口说出，也足以消除人们对马格里偏袒英国的怀疑。

在薛福成任期内担任参赞的许珏，曾把马格里和赫德作了对比，认为他们是一类人。在给军机大臣许庚身的一封信中，他写道：“盖赫德为总税务司，握中外贸易之权；马格利[里]为使署参赞，任两国折冲之事。此两人原系英人，偏袒本国，固无足怪。”[37]许珏屡次就此事和驻英公使薛福成进行辩论，但薛福成不同意许珏的观点。薛福成是极具爱国心的人。在出使英国前，他曾经反对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，更挫败了赫德想统帅中国海军的野心。因此，他不同意许珏的观点，自是有其根据。

其实，在处理涉及中英两国之间的问题时，马格里和赫德的观点多有不同，尤其是在中英缅甸问题时，二人的意见完全相反。马格里维护中国的利益，而赫德则非常关心维护英国的利益。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馆配合默契[38]。他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两种解决办法，一是中国迫使缅甸向英国赔款；二是英国可以采取任何

行动，只要承认缅甸和中国的朝贡关系即可。这两种办法实际是纵容英国占领缅甸，无一对中国有利。赫德最赞同第二种办法。[39]他反对中国拓展边界。无疑，赫德的这个立场，对中国维护边疆安全是非常不利的。

马格里和赫德两人在对华观点上的不同，与两人和英国外交部的关系不同，有一定关系。赫德及其所控制的中国海关，被英国看作扩大英国在华权益的工具，并对其加以支持，与之保持密切联系。英国外交部经常向赫德询问对华政策问题，赫德也经常向英国外交部提供中国情况。但马格里就不同。他到中国驻英使馆任职，主要是曾纪泽和李鸿章的推荐，尤其是李鸿章的推荐，起关键作用。郭嵩焘不能辞退马格里，就是因为他是李鸿章推荐的，郭嵩焘"除接受外别无他法"，[40]因此，马格里基本上是纯粹的中国使馆雇员。马士说："三十年来——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，他（马格里）可以说是中国驻伦敦使馆中的每一任公使的能干的、忠诚的和得到信任的顾问。"[41]除了在郭嵩焘任期以外，这个评价大体是公允的。

学者研究十九世纪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，一般会发现他们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，即他们是中国的雇员，为中国工作；但他们又是西方人，而西方列强又是侵略中国的。因此，他们难免会为西方的侵略利益服务。例如马格里，他为中国驻英使馆工作，维护中国的利益；但当中英之间发生冲突，那么马格里是为中国服务，还是为英国服务？通过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发现，马格里基本上是为中国政府服务，当中英之间发生争端时，他通常站在中国的一边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对待近代来华的西方人时，切忌因为他们是西方人，就采取先入为主的立场，把他们当作西方侵略中国的工具。不同的西方人之间，其观点有区别，应该具体分析。

---

①如驻美使馆任用的柏立，金山总领事署的傅列秘，纽约领事署的黑敦奴，驻西班牙使署的马治，古巴总领事署的溪理察，驻秘鲁使署的爱文斯等等。

②Demetrius C. Boulger: The Life of Gordon, London, T. Fisher Unwin, 1896. p. 104 - 105;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. p. 100.

③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, p. 482 - 483.

④ibid., p. 263.

⑤ibid., p. 242.

⑥ibid., p. 262.

⑦ibid., p. 483.

⑧ibid., p. 265.

⑨ibid..

⑩ibid., p. 270.

⑪Owen Hong - Hin Wong. 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rt Britain, Chung Hwa Book Co.· Ltd., p. 154.

⑫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Wacartney, p. 288 - 289.

⑬《郭嵩焘日记》卷三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第167页。

⑭《中国海关密档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，第539页。

⑮同上，第559 - 560页，第616页。

⑯《中国海关密档》第八册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120页。

⑰《郭嵩焘日记》第三卷，第167页，第183页，第207页，第264页，第381页，第415页，第586页。

⑱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, p. 312 - 313.

⑲ibid., p. 397 - 398.

⑳ibid., p. 399.

㉑ibid., p. 400 - 401.

㉒ibid., p. 397.

㉓ibid., p. 407, 411.

㉔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21，第24页。

㉕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》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196页。

㉖同上。

㉗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, p. 349 - 350.

㉘《中国海关密档》第四册，第300、332页。

㉙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61，第16页。

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61，第37页。

㉛薛福成：《庸庵全集·海外文编》卷一，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。

㉜转传引自李恩涵：《曾纪泽的外交》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版，第266页。

㉝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62，第27页。

㉞《中国海关密档》第五册，第545页。

㉟薛福成：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》，岳麓书社，第482页。

㊱使英薛福成奏马格里堪备任使片，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89，第29页。

㊲许珏：《上许星叔先生》，《复庵集》卷七，第306页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。

㊳Wright, stanley F.,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, Belfast, the Queen's University, 1950. p. 555.

㊴ibid., p. 555.

㊵《中国海关密档》第一册，第616页。

㊶马士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二卷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，第346 - 347页。

（作者吴宝晓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；邮编050091）